

老教授智取钱坑王

——台北骨董市场见闻记之二

罗青

钱坑王如何得罪老教授？

重庆南路书店街的骑楼走廊中，缓缓踱步，走过来一个矮胖秃头的老者，他鼻梁上低架着圆形的金丝眼镜，口中斜叼着短短黑色烟斗。走过一家骨董店，在一家笔墨庄前停了几秒钟，又慢慢折了回来。口中喷出若有若无的轻烟，舒卷飘散，像他脑后若无还有的头发。

在春天梅雨连绵，夏天烈日台风的台湾，骑楼（veranda）之设，对逛街的人，实在是一大福音，既能遮烈日、避骤雨，又能挡颶风，是这个嘈杂城市里，陷入邂逅或恋爱的最佳场所，无论是对闲闲经过骑楼的人，还是对痴痴等待在橱窗里的物。

骑楼里，那家骨董店面的右侧，是大横玻璃橱窗，占店面五分之三，迎面挂了一幅黄宾虹的中堂大山水，好似颜色彩照人的仙翁；两旁配以吴昌硕的石鼓篆对，有如蟠龙卧虎的护卫；右侧靠墙，则孤零零地挂了一条赵之谦五言楷书对的下联，虽然只有一条，但宣纸已清雅得微微泛灰，配合方折跳跃的笔法，光彩夺目的墨色，确是风华绝代，让人观之忘我。台面上平放的，右侧是吴伯滔的设色山水册页，古茂灵动无双，才情逸趣，远远超过他的儿子吴待秋。左侧是任伯年为“饭石先生”所作的肖像人物行乐图横幅，像主眉宇神情，栩栩如生，双眸炯炯，精光四射。

店面的左侧，是狭长深入型的玻璃橱窗，占店五分之一，两个橱窗之间，凹入一个进门地毯的空间，是骨董店的玻璃大门。狭长橱窗台面上，摆放各色古旧磁砚，靠墙则挂着齐白石的花鸟四屏，站在门外要歪头翻眼往上看，才能看全，但见鸟、竹、松、桂，无一不是精品。至于店里两边高墙上所挂字画，则非要推门进去，才看得清。

但见那老者，几次举手要推门入内，又犹疑缩手，退了回来。终于，他毅然转身，离开骑楼，横过马路，朝我站立的书店骑楼内，走了过去。我放下手中正在翻看的新书，迎了上去，笑嘻嘻地招呼：“陈教授好！”“你好！你好！”又见面了，真快，又是两个礼拜过去了。“陈教授细气细气地说，一口浓厚的苏州腔，软得不得了。

陈教授任职于台北师范学院中文系，早岁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，精通诗词与版本之学，酷爱收藏，专嗜明清近代名人手札，兼及中日墨彩书画。师院位于坐西朝东“总统府”的右手边，距离左手边的书店街，只有七八分钟的路程。

1980年代初，我除了在师范大学任教外，每星期五，还要回到台北近郊我的母校辅仁大学去兼课。下午四时左右，我搭校车回到台北，通常提早在“总统府”后的西门町闹区下车，步行到书店街翻看新书，顺便逛逛画廊骨董店，消磨一两个钟头的周末时光，然后才换车回家吃晚饭。

从西门町中华路走到与之平行的书店街，可以经过衡阳路上的书画画廊，也可穿过位于武昌街骑楼的诗人周梦蝶书摊；我一边走，一周看探人，最后殊途同归，总是要到这间台北最佳的骨董店看看，才去公交车站转车。

我与陈教授，是几个月前，在书画画廊的小会客厅里认识的，彼此一见如故，遂被年长的他，拉到一旁的广东小馆里，大吃一顿，喝了三杯订交酒。馆子在狭窄的浣陵街内，设于低矮的小阁楼楼上，灯火温暖，菜肴精绝，不是老饕，等闲是找不到的。每当夜雨初降，在小楼上把酒、晤友、听雨，闲看窗外街灯斜斜一束，照亮细数雨丝一帘，遂有乘车画船横渡沧江之感。从此以后，我俩每月，总要碰上一回，如遇上收到铭心绝品，不免分别打电话回家告假，在小楼上小的品鉴一番。

一日，我照例在下午五时半左右，经过书店街那家骨董店，忽然看见陈教授脸色惨白地推开玻璃门，紧闭双唇，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。见了我，一言不发，把我拉到转角武昌街的骑楼柱子下，低声又尖声地对我说：“这个姓王的，实在欺人太甚，真恨不得弄一白塑胶炸弹，把这家店炸个精光。”平常笑脸常开，轻声软语，谦和有礼的老好

人，居然被惹得发了这么大的脾气，全台台北，大概只有这个该死的外号叫钱坑王的王老板才办得到。 “怎么了？谁惹了你了？”我明知故问。“你看气不气人，他橱窗里挂的那件赵之谦，只挂下联，都半年多了，我上次问店里的小姐，说是上联有上款，要下半年才挂出来，这不是吊人胃口吗？也活该我们迷上这个，一次次跑来看，均不得要领，问价钱也问不出个所以然，逼急了，便说只展不卖，叫人半点办法也没有！”陈教授一面说一面声音还有些发抖，手也跟着抖，真是气坏了。

“好容易，今天遇到老板在，我又厚着脸皮问。你猜怎么着，他居然斜着眼睛看着我：‘你排第十八位，这可是赵之谦送给吴湖帆祖父的，要看，可以，一副对联六十万台币，看得起吗？至于谁能得手，那要看谁出价最高喽！’”

陈教授咬了咬牙，继续说：“我当然知道这副景句联，下联出自谢康乐的五言古诗，是送给湖南巡抚吴大澂儿子吴本善的，赵之谦款印之下，有吴湖帆精工小楷跋跋三行，讲得清清楚楚……”于是他开始施展他惊人的背诵力：“先府君讳本行辈善，字性之，后改字性存，号诤士，二十以后，初字已不用矣，此搦老在光绪十年左右书，君年未及冠。戊寅冬日张心秋兄购得此联于郡城乱离之际，因以见貽志感，愿子孙其永宝之，吴湖帆。下铃一印曰：‘丑移长寿。’”听得我目瞪口呆，无限佩服。

说到这里，他语气一转，恶狠狠地啐道：“不过，说要六十万才能看一眼，叱——还好不到这种程度吧？”他吸了一口烟斗，涨红了脸说：“我知道他们这里高价，每次都是看看了事，不愿多问，免惹闲气！今天既然已经开了口，只好忍气吞声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就给他来个回到底，我转头改向墙上挂的薄心俞对联要多少？”

“你猜猜这个混账怎么回答呀？”他细声细气地学着钱坑王的口气说：“你是不是有薄心俞要卖呀？我明天没空，后天可拿来看看，东西好价钱又合适，我可一次全收！”

“你听听，听听，这哪里像做生意的样子，把骨董店开成了美术馆，真是门缝里看人，把我们这些教书匠，完全看扁了。” “您老别跟这种裱画店学徒出身的人生气，犯不着，反正我们迷的是艺术，之所以忍气吞声，又不是因为他。你的遭遇，我全都碰过，还不止如此呢！比这更混账的事，多了去了。每次我都只是眯着眼，冲他咧嘴一笑，就此罢了，让他丈二金钢，摸不着头脑。”我轻拍陈教授的肩膀好言相劝：“骨董收藏之道，‘仁义’要摆在一边，要靠智、‘眼’、勇。裱画出身的，虽然有些眼力，但终究在知识智力上，差了一大截加两大段，我们搞不起挥金豪夺之勇，但是慧眼拣得大漏的本事，倒是不缺，对付这种人，只能智取。慢慢等好了，总会有机会的，大家走着瞧。” 说着说着，我把陈教授拖着手往沅陵街走。“来来来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喝两盅去，给你消消气，开开心！”

老教授如何智取钱坑王？

钱坑王以爱用小钱收大东西闻名，又以喜好不可一世的漫天开大价钱发臭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，他在中山北路一家裱画店做学徒，仗着师傅是他大伯，游手好闲，胡作非为，不专心学手艺，整天只知鱼肉师兄弟，在店里称小霸王。

他伯父老王，在当时可是少有的一等一裱画高手。上世纪四十年代末，大批高官、大贾、艺术名家群聚台北，使文化贫瘠的大安、中正、中山区一带，不单藏家高手如云，而且精品巨迹充斥。二三十年下来，遂使那一带的裱画店，成了学习书画收藏鉴定的最佳场所。钱坑王年轻时，虽然好折腾，学艺不精，但长相却仪表堂堂，嘴巴灵巧，很会来事。他觉得，裱画一事，繁琐而辛苦，累了一个半死，也赚不到什么钱，远不如店里收画送画介绍买卖这个差事来得对他胃口，而且其中大有甜头可尝。于是遇到机会，他便抢先

亲力亲为，几年下来，与官、商、艺术界，都建立了一定的关系，送礼、中介外加洗钱，无所不通。

五十年代末，他羽翼已丰，便离开中山北路，独自跑到与官府机关及文化人士更为接近的重庆南路书店街，开起了古董店。

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前，台湾骨董店的书画来源有二，一是二战后日本人留下的中国书画收藏及日本书画，二是新移民带来的古今书画。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末，日本经济景气大好，观光客来台，看完外双溪故宫，经过中山北路骨董店，不免大喊便宜，一路买到重庆南路书店街，毫不手软。

一日，陈教授又来到新仇旧恨之地，他既不愿意推门而入，又舍不得掉头就走，于是只好蹭在橱窗之外，徘徊检视，不忍离去。就在他举棋不定，将走未走之际，忽然中间的玻璃门从里往外推开，一人探出头来，原来是钱坑王。只见他满脸堆笑，对着陈教授叫道：“陈老师，好久不见，进来坐坐喝茶嘛！”

“都怪我这双腿不争气，本想摇摇手，充耳不闻，回头就走！”陈教授叹了一口气对我说：“没想到，嘴巴不听使唤，居然连声说好，莫名其妙地就跟了进去。”

“果然这小子！笑声中有诈，客气中有鬼！”他撇着嘴说，“我屁股还没坐热，茶还没喝上一口，他就从大抽屉里抽了一件大立轴出来，往墙上挂！”

“听说你是留日的，平山郁夫（1930—2009）你应该一定知道，这件东西，是不是他的，你给我看。” “我一看，是一轴斧劈水墨人物《松下高士图》；细看绢本质地如新，墨色完好发亮，画面左上角有穷款‘平山’二字，下有一朱文印，漫漶不清，十分难辨。”陈教授顿顿：“但如果从笔法看出‘平山’应该是谁，那这方面图章，就容易辨认了，只消用放大镜一看，就能看出是‘张路印’三个篆字，哪里扯得上平山郁夫！”

“浙派”的东西，当时价钱不高，但像张平山这样，与吴小仙、周东村同时的明代中期名家，价钱也便宜不到哪里去。况且美国的班宗华（Richard Barnhart）与纽约大都会美术馆，正在筹备为“浙派”翻案做大展。自从消息走漏以来，连蒋三松的东西，都渐渐有水涨船高的趋势。

“这件东西，拿来卖的人说是平山郁夫早年学习‘南画’时期的临摹之作，只要台币五万。这几年他在大

陆那边很红，要是近期的作品，五十万也不止！”

“平山郁夫学过‘南画’？”陈教授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没听说过，这倒是要研究研究。”

“这真是太好了，我说嘛，这样的画，只有像陈老师这种有学问的人，才能真正欣赏研究。那些张口闭口随便喊‘假’的人，实在是连书画的边，都没有摸到，就在那里胡乱号称专家，笑死人了。”

“经你这样一说，这件东西，我好像非买不可了，怎么样，打一个折吧，既然别人都不要，我正好拿回去做教学研究用。”

“陈老师，你真的要？” “要是价钱可以，可以试试。”

“喂——呀——！陈老师，这件东西在我手中已压半年多了，至少要七万才够本！” “我会开价销大呀！”

“我看你进价不会超过两万，四万可以出手啦。”

“唉哟，陈老师，你真会开玩笑，我这个店面，租金贵得吓死人，几个月撑下来，赔都赔死喽。”

“四万五，是我两个月的薪水呢！” “好了，好了，五万就五万，赔本支持你教学研究啦——陈老师——师！”

“好，可以，你等一下，我到旁边邮局去提钱！”

陈教授在小楼上，对我展开他的战利品时，老花眼镜片下，闪烁出一道狡黠的光芒，看他撇着嘴说：“郁夫的画面，怎么会落款‘平山’？”满脸踌躇志满的样子。

尾跋：字对下联 如何变成横额一幅

三十年后，2013年，香港某拍卖公司，拍出了一幅赵之谦的五言楷书横披轴心，墨色笔法，灵动精彩，纸本底子，完好如新，以276万港币高价拍出。

从拍卖目录上所精印的作品彩图中，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横额最左处，赵之谦款识铃印之后，出现了吴湖帆的三行尾跋。具体内容，与我当初在那条下联中所看到的，完全一样，只是在“戊寅冬日张心秋兄购得此联于郡城乱离中”一句中，“得此联”三字，消失不见了。

是的，“得此联”三字，非消失不可。不然，赵之谦的楷书谢灵运五言诗句“横额”，就写不成了。



天羽 (国画) 蒋云龙

西装，现代绅士的盔甲

曹可凡

身着西装背心，嘴里叼着香烟，不停地坐在床沿修剪指甲，然后起身，披上西装，整理下衣袖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数着一大叠钞票，再抽出一张餐巾纸，折成手绢模样，插入左侧上衣口袋，最后用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。看了下腕上手表的时间，拉灭床头灯，离开阁楼……

这是电影《阿飞正传》尾声，梁朝伟最经典的一个镜头。梁朝伟身着西装的横样也嵌入人们记忆深处，久久无法忘怀……

西装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，其结构源于北欧南部日耳曼民族服装。法国贵族菲利普从渔民服饰获得灵感，与一班裁缝潜心研究，设计出敞领、少扣，既便于行动，又保持传统服装的庄重。于是，今日所谓的“西装”便应运而生。数百年来，欧洲上流社会对男士西装极为讲究，因为它代表了穿着者的品位、格调与财富，正如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里的台词所说的那样：“尽你的财力购置贵重的衣服，可是不要炫耀立异，必须富丽而不浮艳，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；法国的名流要人，就是在这点上显得最高尚，与众不同。”卡夫卡曾在日记里记下对裁缝，选择西装时的尴尬与纠结：“当我听说，还要裁剪出西式服装坎肩，而且还得穿上一件上浆的硬衬衫时，我几乎对我的力量变得有信心了，因为这样一种穿法必须拒绝。我不想要这种样式的西服上衣。……当我后来一直羞愧地躲避，没有说明，没有愿望地听任量体裁衣并试穿时，裁缝在理解上就更加产生惊悚了。”

中国第一套西装诞生于清末，由“奉帮裁缝”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所制作。历史算不得长。难怪张爱玲感叹：“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。另一个极致的时期，民国四年至八九年，……目前中国人的西装，固然是谨严而黯淡，遵守西洋绅士的常规，即使中装也常年地在灰色、咖啡色、深青里面打滚，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。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，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，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。”

然而，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，无论是北京、南京，抑或上海、广州那样的繁华都市，政商名流和文人骚客如宋子文、顾维钧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梁实秋、陈光甫等，均以着西装为一种时尚与风潮。梁实秋先生甚至说：“西装的势力毕竟太大了，到如今理发匠都是穿西装的居多。”梁实秋腹笥深厚，对西装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美学标准：“做裤子的材料要厚，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的装裤，光线透穿，真是骇人！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，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衣裳的男士们，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，颜色惊人的衬衣，如火如荼的领结，那样子只有在国外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！大概西装破烂，固然不雅，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。所谓洋场恶少，其气味最下。”

民国时期，甚至有人因着装而逃过一劫，至今听来令人匪夷所思。宋子文夏季总穿一套高级毡毛薄哔叽西服，头戴一顶黄色礼帽，拄一根手杖，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，那身装束也几乎成为他的标志。1931年7月23日，宋子文由南京抵沪，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，淞沪警备司令杨虎，以及黄金荣、杜月笙等一千“海上闻人”聚集火车站迎接。不料，“刺杀大王”王亚樵机埋伏于车站周遭，企图行刺宋子文。当火车进站，那标志性形象出现在刺客视野，刺客迅疾拔出手枪，冲目标连发两枪，那绅士应声倒地。然而，次日报纸一行黑体字标题赫然跃入眼帘：“宋子文侥幸逃过一劫。”

不过，那时候也有人西装嗤之以鼻。林语堂在《论西装》一文里说：“在一般青年，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，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，因为穿西装虽有多种不便，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，风俗所趋，佳人所好，才子也未必能免俗。至于已成婚而子女成群的人，尚穿西装，那必定是他仍旧屈服于异性的微记了。人非昏聩，又非惧内，决不肯整日手挂那条狗领而自豪。在要人中，惧内者好穿西装，这是很鲜明的事实。也不是女子尽喜欢作弄男子，令其受苦。不过多半的女子似乎觉得西装的确较为摩登一等。况且即使有点不便，为伊受苦，也是爱之表記。”无论如何不能理解，“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如林语堂者，竟会对西装抱有如此深刻的偏见。

但是，像林语堂那样鄙视西装的人毕竟还是少数。听父亲讲，旧时候的上海，但凡有头有脸的仁，总要置办几套西装。据说，做两套上等英国呢三件套西装，或许要花费一两黄金的代价。即便是写字间低等职员，起码也要备上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。因此，上海滩的大街小巷，不同层次西装店林立。如同木心所言：“西装店等级森严，先以区域分，再以马路分，然后大牌名牌，声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顾长户头，否则何以攀跻人夸示人？当年是以英

国为经典，老中绅士就之；法国式为摩登，公子哥儿趋之；意大利式为别致，玩家骑师悦之。”高级定制店通常服务周到，店内装饰典雅。当客人走进店里，伙计鞠躬欢迎，奉上咖啡或茶，寒暄之间，需察言观色，从只言片语中了解顾客喜好，以便作恰如其分的推荐。做西装，选料为首要工序，按《上海赋》：“那时独尊英纺，而且必要纯羊毛……夏令品类派力斯、凡力丁、雪克斯丁、白哔叽等；冬令品类巧克丁、波斯呢、唐令哥、厚花呢等；春秋品类海力斯、法兰绒、轧别丁、舍维、霍姆斯本、薄花呢等。”选完料，就决定要高商西装款式。“三件头、两件头、独件上衣，两粒钮、三粒钮，单排、双排，贴袋、嵌袋、插袋。还要商量夹里，半里、全里、羽纱……”然后，便是量尺寸。伙计量尺寸并非简单记录下一组数据，而是要根据客人不同身材，对固有尺寸进行弹性处理，以弥补身材之缺陷。最后一道工序是试样。伙计给客人试样时，通常“手提粉粉，口噙别针，全神贯注，伶俐周到，该收处别别，该放处画线，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。其实他胸有成竹，毫不迟疑。而你，在三面不同角度的大镜前，自然地转动，靠近些，又退远些，曲曲臂，挺挺胸，回复原状，并腿如何，要‘人’穿‘衣’，不让‘衣’穿‘衣’。这套驯衣功夫，靠长期的玩世经验，并非玩世不恭。”

所以，一件定制西装，绝非普通商品，而是如同竹刻、紫砂茶壶、缙丝、青花瓷一般，是一件无法复制的珍贵艺术品。

记忆中自己拥有的第一件西装是由美国的叔叔1979年所赠。从未见识过西装，可一穿上那件轧别丁浅蓝色西装，顿时感到身材修长了许多，有一种通透清爽的感觉。后来父母又帮我配上一条灰色西裤，系上一条深藏青领带，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，可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也算是很时髦的装束。没过几年，我便穿着这身行头，参加《我爱祖国语言美——上海市普通话电视评比》，完成了人生电视荧屏处女秀。随着生活日益改善与工作需要，购买品牌西装成为首选。然而，对我等“丰腴”之人来说，要买到合适的西装，亦并非易事。通常要太过紧，西装扣起后，胸前有拉扯感，肩部与肘部活动受限；要么过于肥大，松松垮垮，视觉上呈筒状，袖子也相应过长，遮盖衬衫袖口，一副“瘦三样”。直至西装定制业兴起，才知道胖人西装制作秘诀在于版型把控，既要让人穿起来有足够空间，不紧绷，同时又需要有腰型的线条。由于“丰腴”型男士主要在“肚子”和“后腰”两部分凸出，故设计师需将肚省加大，也要适当做“减法”，如后背要做吸腰处理，如此这般，方能既有腰身又不显得肥大。

“Wear your treasure and you will be treasured”（家珍披身，如若九五之尊）。身着一套有良好尺寸感、适度颜色、线条明朗而利落、耐人寻味材质与剪裁、自我与时尚气息平衡的西装，无论年长或年少，均可以崭新姿态迎接新一轮太阳。因为，西装便是现代绅士的盔甲！

笔会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 微信二维码